

崔述學術考論



A Critical Study of Cui Shu's
(1740-1816) Scholarship

邵東方 著

SHAO Dongfang

崔述學術考論

A Critical Study of Cui Shu's (1740-1816)
Scholarship



邵東方著
SHAO Dongfang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崔述學術考論 / 邵東方著. -- 初版. -- 臺北
縣永和市：Airiti Press, 2010. 08
面；公分

ISBN 978-986-6286-19-3 (平裝)

1. (清)崔述 2. 學術思想 3. 史學

127.5

99008729

崔述學術考論

作者／邵東方
總編輯／張芸
責任編輯／古曉凌
封面編輯／吳雅瑜
內文校對／顏若瑾

出版者／Airiti Press Inc.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一段80號18樓

電話：(02)2926-6006

傳真：(02)2231-7711

服務信箱：press@airiti.com

帳戶：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中和分行

帳號：045039022102

法律顧問／立暘法律事務所 歐宇倫律師

I S B N／978-986-6286-19-3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第二版

定價／NT\$5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序¹

劉家和

這是邵東方博士所著的《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顧名思義，這就是要論崔述的學術，而且是就中國學術史而論之。書中的內容正好包括了這兩個方面。

現在東方要我為他的這本書寫一篇序，我很快就想到的是，人們目前是否還認為有研究崔述學術的必要和可能的問題。也許有人會說，關於崔述，早在本世紀前期顧頤剛等先生已經研究過了，結論也早有了，現在還有什麼再研究的必要？又也許有人會換一個角度說，崔述當然還是可以再研究的，不過以前研究他的學者都是一些大師，現在我們是否還有取得新進展的可能？在這裡我願意談一些管見，請專家和讀者們指教。

首先談對於崔述是否有再研究的必要與可能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含有兩層意思：一是崔述學術的本身是否還有再研究的價值，二是經過顧先生等的研究以後，是否還有再研究的必要。

關於第一層意思，比較簡單，因為崔述學術主張的核心是「無徵不信」，這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實在是一個有永恆意義的命題，只要有用「六經注我」的方法研究歷史的現象存在，崔述的上述主張就總值得我們記取和思考。

關於第二層意思，顧頤剛等先生在幾十年前對於崔述的研究，無疑是非常有價值的，將使他們的學術晚輩永遠懷有敬意。為什麼呢？因為第一，顧先生等隨著時代和學術的進展，把崔述為了維護儒家經典的純潔性而進行的疑古辨偽，發展成了為維護歷史和文獻真實性的疑古辨偽。以儒家經典為基準的疑古辨偽固然也要求真，但它的是非定於一

¹ 本書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初版，名為「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本文是劉家和先生為初版所作的序，今仍用之。

尊，即儒家經典之一尊，所以其特點是封閉的；以歷史真實性為基準的疑古辨偽，則除了知識的限制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限制，而知識的限制本身總是要在歷史的過程中被否定的，所以應該說顧先生等的學術特點是開放的。

第二，顧先生等在事實上也絕對沒有封閉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而恰恰是打開了新的思路，顧先生曾說：「我們如果善學崔東壁，就應當超過崔東壁。」²「善學」就要「超過」，這對於我們是多麼重要的啟發。不僅如此，顧先生他們在討論問題時，也是讓各種意見充分發表，顧先生編《古史辨》時是如此，編《崔東壁遺書》時也是如此。就以後者為例來說，顧先生請他的朋友錢穆先生為這部書寫序，而錢先生的見解實際上是與他不同的。³甚至顧先生的老師，也就是促使他研究崔述的胡適之先生，同他的看法也是有同有異的。這裡不妨引用這兩位先生為此書寫的序中的話來作比較，顧先生說：

總之，他〔崔述〕根本的誤處，是信古史系統能從古書中建立起來，而不知古書中的材料只夠打破古史系統而不夠建立古史系統。這個問題，康有為已經抉摘出來了。⁴

他在此引用了康氏《孔子改制考》的第一卷《上古茫昧無稽考》，康氏在此中對崔述所採用的中國古史材料都取一概否定的態度，而顧先生頗以為然。這從當時破舊心切的角度來看，我們是能夠理解的。可是，胡先生在序中說：

總而言之，近幾十年的古史研究，大體說來，都已超過崔述的時代。一方面，他所疑為「後儒」妄作妄加的材料，至少有一部分（例如《檀弓》）是可以重新被估定，或者竟要被承認作可靠

² 顧頤剛：《崔東壁遺書序》，見顧頤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頁65。以下引此書只注書名、篇名和頁數。

³ 參見錢穆：《崔東壁遺書序》，《崔東壁遺書》，頁1046-1052。

⁴ 顧頤剛：《崔東壁遺書序》，《崔東壁遺書》，頁64。

的材料的了。另一方面，古史材料的範圍是早已被古器物學者擴大到幾部「經」之外去了。其實不但考古學的發掘與考證擴大了古史料的來源，社會學的觀點也往往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可以使舊日學者不敢信任的記載得著新鮮的意義。例如《檀弓》、《左傳》等書，前人所謂「誣」、「妄」的記載，若從社會學的眼光看去，往往都可以有歷史材料的價值。⁵

所以只要把顧、胡二位先生的上述說法一相對照，我們恐怕就不能再說這些學術前輩們已經徹底解決了問題、封閉了這一研究，相反地，倒應該說他們的確給我們留下了可以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那麼自從「古史辨」學派出現到現在，古史研究的學術條件是否已經有了歷史性的變化呢？應該說變化還是很大的。一方面，考古發現和研究在近幾十年間有了空前的發展，取得了重大的成績，這是胡先生為《崔東壁遺書》寫序時難以預料到的；而這些成績足以使我們從過去往往疑為偽作的文獻裡看到很多真東西，例如《周禮》，過去幾乎被視為全無價值的偽書，而現在竟然從金文材料中得到了很多官名的印證。不斷出土的古文獻，使我們對過去多有懷疑的書不能不刮目相看。這些進展，其意義不僅在於對一兩本具體古書的真偽鑒定之上，而且在於使我們更加注意對古籍從多重角度加以慎重考察之上。

另一方面，近幾十年來在史學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進展。以前從事疑古辨偽的學者對於真偽史料的劃分是十分明確的，他們既對偽材料充滿懷疑，又對真材料充滿信心。崔述以為經書是可信的，非經書是不可信的，一信一疑，二者之間的界線極為清楚。十九世紀的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主張批判一切不可信的材料，而對於經過嚴格批判而被確認的第一手材料則充滿信心，所以他才能滿懷信心地說史學家能夠「如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直譯當作「像其本身所是的那樣」)寫出歷史書來。在這一點上，顧頡剛等先生同他們的

⁵ 胡適：《崔東壁遺書序》，《崔東壁遺書》，頁1044。

中國和外國前輩們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疑古辨偽的目的就在於求真，而對所辨得的真，他們是充滿信心的。可是，物極必反，在西方，與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思想相對立的相對主義史學思想，在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前期也相應地產生了。好吧，你說你的史料是第一手的，他就問你，一個曾經親身經歷了一次戰爭的戰士甚至統帥所寫關於這次戰爭的作品算不算第一手材料？你如說是，他就會說，一個人不可能親歷一次戰爭的一切過程和一切方面。於是你的第一手材料就成了問題，至少要打一個七折八扣。你說你的材料齊全，他就說歷史上的事情有無限的方面和層次，歷史上的記錄從來就不可能完全，即使你做到了「竭澤而漁」，那也不能說你掌握的材料已經完全覆蓋了客觀歷史事實。你說你的態度是純客觀的，他就說，歷史學家著書，不僅在所用材料上有選擇，而且連寫什麼主題都有選擇，而這一切選擇都出於史學家的主觀的價值標準，你怎能說是純客觀的？例如，西方的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歷史學家貝克(Carl Becker, 1873-1945)、俾爾德(Charles Beard, 1874-1948)等，就都從哲學的或史學的角度提出了這一類充滿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問題。當然，對於相對主義史學思想也出現了批評。我覺得美國學者曼德爾包姆(Maurice Mandelbaum, 1908-1987)所著《歷史知識問題》(*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⁶對於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回答是相當精彩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我在這裡只想說明，相對主義史學思想，就其對於蘭克那樣的史學絕對客觀說的批判來說，不可否認有其積極的意義；但是就其把相對絕對化的情況而言，它就又重複了它的批評對象所犯的錯誤，於是歷史在他們那裡變成了思想史，成了純主觀的東西，其實這只是把前人的錯誤在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地方再來一次。不過，經過這一次錯誤的克服，作為研究歷史學的人，到了這個世紀之末，我們總可以有了一種新的認識。作為史學工作者，我們既要努力弄清歷史的客觀過程即求真，又不能不虛心地承認，我們所能求得之真總是有其一定

⁶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限度的。我們不同意相對主義的史學思想，而承認有限度的或相對的實在本質上仍然是真；同時，也不同意實證主義史學思想，不再天真而自負地去追尋絕對的或純客觀之真，而只能細心地從含有前人解釋或價值判斷的材料中去把握歷史之真。我們注定只能力求逐步地逼近歷史之真這一極限，而不幻想一步達到這個極限。諸如此類的認識，在二十世紀前期顧先生等從事古史辨活動的時候，大概還沒有提上中國史學界的思考日程。就連胡適之先生在談到新觀點「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的時候，似乎也還沒有考慮過如何對待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問題。這就是說，幾十年來史學思想和方法的歷史條件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發展。

既然有了以上兩方面的巨大發展，現在再來研究崔述就不能認為是多餘的，而確為必要的了。

至於現在的研究是否有可能取得比前輩更多的新進展，那就要看我們的努力如何了。那麼是否必須是大師才能從事這種研究呢？這倒未必。須知顧先生開始古史辨偽研究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初，當時他年未滿三十，也還不是大師；顧先生成為大師是他多年研究後的成果證明的，不是先成大師而後才有成果。所以我認為，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從事某一課題的研究是必要的，至於研究者是不是大師，可以先不管它。如果必先為大師而研究，那麼人類就不會有大師了。

當然，必須承認在當前研究崔述決非一件易事。那麼難處在哪裡呢，這一本書又是從什麼地方努力的？這就是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

我以為，研究崔述之難，難在兩個方面，更難在這兩個方面的結合上。哪兩個方面呢？一是既然要研究崔述，就不能不追蹤他所研究的內容，即中國古代經史之書及其所載之事。就此一點而言，這對當前的中青年學者來說，真是談何容易。可是，如果不鑽進去，只在崔述的一般學術主張上兜兜圈子，那麼這樣的研究恐怕倒真是不能有新進展了。真鑽下去，這在某種程度上差不多也可以說要有下地獄的決心。這是從微觀的角度說。可是，只有這一方面的努力是不夠的。如果不能考慮到當前研究方法上的發展，那麼，即使鑽的深度達到清朝漢學專家的程度，那同樣沒有多少價值；因為鑽進去了出不來，只不過多了一位次崔述而

已（純粹跟從崔述，只能成為次一等的崔述。這個意思和顧先生說的學崔述就要超過崔述是一樣的），又有何益？或者換一種方法，把崔述不放在眼下，引用一些現在時髦的理論或方法，天花亂墜地縱論一通，新則新矣，可是又容易流為無根之談，恐怕也未必能有新進展。所以，這裡我們還必須說到第二種難處，那就是目前在西方盛行的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等，對於研究崔述的確是很有參考價值的。可是，我們要認真地學習一下（而不是隨意的「掠奪性的開採」），那又談何容易。我們是研究史學的，要有一些自知之明，不幻想成為哲學家，但是既要試圖援用它，就不能不下點功夫認真讀一些。我們只能從中獲得某些啟發，來開拓史學研究的思路。這是從宏觀的角度上說。

記得從前有一位學術前輩說過，「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這已經很不容易。而現在則是要「上窮碧落下黃泉，以求稍有新發現」，這就更是難上加難了。由此我想到了美國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一篇文章《必要的張力：科學研究中的傳統和創新》(The Essential Tension)。他說，科學的發現，既需要發散思維即對於傳統具有突破性的創新思維，又必須有向心思維(convergent thinking)即深入傳統的思維。這是因為，沒有前一種思維，就會限於傳統而失去創新的可能；沒有後一種思維，就不能深知傳統中的問題與病因所在，就不知到底為何需要突破，應該從何突破，即使突破也破不到點子上，何來創新？所以，他概括地說：「成功的科學家常常必須同時扮演傳統主義者和離經叛道者的角色。」⁷ 孔恩講的是科學發展的要求，其實對於史學的發展來說，這幾乎是同樣適用的。這就是要「上窮碧落下黃泉」，要有微觀與宏觀、傳統與創新兩極之間的張力。要真正形成這樣的張力，這就更加談何容易。

現在我可以高興地說，東方在這本書裡是盡力朝這兩個方向努力

⁷ Thomas Kuhn, "The Essential Tensio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Third (1959) University of Utah Research Conference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eative Scientific Talent*, edited by Calvin W. Taylor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59), 162-74.

的。他對崔述學術的研究，不是先列崔氏自己所說的學術主張，然後再羅列事實，以說明崔氏是怎樣在學術實踐中貫徹自己的主張的，而是寧可從崔述所研究過的具體問題入手。這樣，他就必須重視在微觀問題上的努力。例如，他研究崔述對周公稱王問題的見解，不僅研究崔述所引用的材料，而且十分注意清代以至近代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別注意考古新發現的成果。這樣的工作自然不可能是太輕鬆的。又如，他對「今本」《竹書紀年》諸問題的考論，⁸ 直接地說，他是在同陳力先生商榷，間接地說，他仍然是在探討崔述所曾探討過的問題，即繼續崔述對「今本」《竹書紀年》的工作。陳力先生的文章是否定崔述對於「今本」《竹書紀年》的辨偽結論的，而且寫得很博雅，東方不同意陳力先生的看法，就不能不與這一篇引證廣博的文章相辯論。這樣的工作，也是必須在微觀上下功夫的。

東方雖然從微觀方面著力研究崔述，但又不僅僅以此為滿足。他對於崔述具體文章和論點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為了從更深的層次去瞭解崔述本身。例如，通過對崔述的周公不曾稱王說的分析與評論，他一方面是要辨別此一問題之是非，而另一方面則進一步瞭解崔述學術內部的深層矛盾：雖然崔述在主觀上力求擺脫成見，但是在客觀上並未能完全排除先入之見的作用。

瞭解或把握崔述學術的內在矛盾，似乎是他這一本書的各篇中都可以看到的話題。書中第一篇談崔述學術的幾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從四個方面探討了崔述學術的內在矛盾。說到這裡，有一點必須交代清楚，那就是，討論崔述學術的內在矛盾，決不意味著崔述的學術是充滿矛盾而不值一提的。相反地，我們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幾乎歷史上一切有成就的大學者都不可避免地有其深層的內在矛盾。如果他的學術已經到了完滿無缺而無任何矛盾的程度，恐怕學術發展真的就要到他為止了。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說：「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並

⁸ 本書再版未收此篇文字，此篇現收於邵東方：《竹書紀年研究論稿》（臺北：Airiti Press，2009）。

且由於自相矛盾而自己揚棄自己。」⁹ 我們這裡所說的崔述學術的內在矛盾，就是從這個意義而言的。所以，東方努力把握崔述學術內在的深層矛盾，決非要對崔述作簡單的否定，而是力求從更深的層次來看清，崔述的學術是怎樣從其前輩學者轉化而來的，又是怎樣對以後學者發揮其影響的。力求看清崔述學術的內在矛盾，就是力求瞭解它是怎麼樣在中國學術史中運動的。

當然，以上的說法也許還嫌不夠具體，現在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崔述說：「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¹⁰ 又說：「余生平不好有成見，于書則就書論之，于事則就事論之，于文則就文論之，皆無人之見存。」¹¹ 可是，就在崔述批評「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一段文字之中，他列舉了兩個事例作為說明，一是關於一位行善的僧人的，一是關於他自己的。這些不都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嗎？崔述自己甚至都沒有發現這樣的問題。胡適之先生顯然比崔述高明多了，他發現了崔述有「自壞其例」的地方。這真能發人之耳目，使人們的思維有所突破。胡先生還很厚道地說：「這都是時代風氣的限制，不足為崔述的罪狀。」¹² 這些話都說得很中肯。不過，到了哲學詮釋學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其他學科尤其是史學的今天，我們就不能只把話說到胡先生那種程度為止了。因為崔述要考證古史就不能不理解古史，如果不用他已有的知識或先有的判斷去看古史，他又如何能理解呢？所以，以己度人、以今度古本來就不是可以避免的，甚至還可以說，它也是認識賴以進行的一個主觀前提。那麼照這樣說，人們是否就可以任意地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呢？當然絕對不是，其間有一對於「先見」（*prejudice* 或 *vorurteil*）既須承認其必要性，又要明確其合理程度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又是胡適之先生當年所不及討論的，也屬於一個歷史限制的問題。而東方書中的《經義求真與古史考信——崔述經史考辨之詮釋學分析》

⁹ 黑格爾著，賀麟譯：《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頁177。

¹⁰ 崔述：《考信錄提要》，《崔東壁遺書》，頁4。

¹¹ 崔述：《考信錄提要》，《崔東壁遺書》，頁16。

¹² 胡適：《崔東壁遺書序》，《崔東壁遺書》，頁1044-1045。

一文就是試圖在這一點上作新解釋的。據我所知，似乎還沒有前人從這樣的角度論述過崔述學術中的內在張力(tension)。如果真的是這樣，東方的這一努力儘管只是一個開始，也應該說是有意義的。

因為這十餘年來和東方在學術上的往復討論較多，比較瞭解他的學術思路，所以謹作序言如上，尚祈有關專家及讀者有以教之。

1997年10月於北京師範大學補拙未暇書室

目錄

劉家和序	3
第一篇 關於崔述學術的幾個問題	13
第二篇 崔述的疑古考信和史學研究	
——與王元化先生論學書（1992年5月25日）	49
王元化致邵東方書（1991年8月10日）	69
王元化致邵東方書（1991年12月4日）	71
王元化致邵東方書（1992年5月7日）	72
王元化附識（1992年7月12日）	74
第三篇 崔述的古史考證與周公攝政稱王問題	85
第四篇 崔述在清代儒學定位之重新考察	111
第五篇 論胡適、顧頡剛的崔述研究	173
第六篇 經義求真與古史考信	
——崔述經史考辨之詮釋學分析	249
附錄 崔述：《考信錄提要》	289
Prolegomena to My <i>Inquiries into Verifiability</i> (<i>Kaixinlu tiyao</i>)	321
初版後記	393
再版後記	394

目錄

劉家和序	3
第一篇 關於崔述學術的幾個問題	13
第二篇 崔述的疑古考信和史學研究	
——與王元化先生論學書（1992年5月25日）	49
王元化致邵東方書（1991年8月10日）	69
王元化致邵東方書（1991年12月4日）	71
王元化致邵東方書（1992年5月7日）	72
王元化附識（1992年7月12日）	74
第三篇 崔述的古史考證與周公攝政稱王問題	85
第四篇 崔述在清代儒學定位之重新考察	111
第五篇 論胡適、顧頡剛的崔述研究	173
第六篇 經義求真與古史考信	
——崔述經史考辨之詮釋學分析	249
附錄 崔述：《考信錄提要》	289
Prolegomena to My <i>Inquiries into Verifiability</i> (<i>Kaixinlu tiyao</i>)	321
初版後記	393
再版後記	394

序¹

劉家和

這是邵東方博士所著的《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顧名思義，這就是要論崔述的學術，而且是就中國學術史而論之。書中的內容正好包括了這兩個方面。

現在東方要我為他的這本書寫一篇序，我很快就想到的是，人們目前是否還認為有研究崔述學術的必要和可能的問題。也許有人會說，關於崔述，早在本世紀前期顧頤剛等先生已經研究過了，結論也早有了，現在還有什麼再研究的必要？又也許有人會換一個角度說，崔述當然還是可以再研究的，不過以前研究他的學者都是一些大師，現在我們是否還有取得新進展的可能？在這裡我願意談一些管見，請專家和讀者們指教。

首先談對於崔述是否有再研究的必要與可能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含有兩層意思：一是崔述學術的本身是否還有再研究的價值，二是經過顧先生等的研究以後，是否還有再研究的必要。

關於第一層意思，比較簡單，因為崔述學術主張的核心是「無徵不信」，這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實在是一個有永恆意義的命題，只要有用「六經注我」的方法研究歷史的現象存在，崔述的上述主張就總值得我們記取和思考。

關於第二層意思，顧頤剛等先生在幾十年前對於崔述的研究，無疑是非常有價值的，將使他們的學術晚輩永遠懷有敬意。為什麼呢？因為第一，顧先生等隨著時代和學術的進展，把崔述為了維護儒家經典的純潔性而進行的疑古辨偽，發展成了為維護歷史和文獻真實性的疑古辨偽。以儒家經典為基準的疑古辨偽固然也要求真，但它的是非定於一

¹ 本書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初版，名為「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本文是劉家和先生為初版所作的序，今仍用之。

尊，即儒家經典之一尊，所以其特點是封閉的；以歷史真實性為基準的疑古辨偽，則除了知識的限制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限制，而知識的限制本身總是要在歷史的過程中被否定的，所以應該說顧先生等的學術特點是開放的。

第二，顧先生等在事實上也絕對沒有封閉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而恰恰是打開了新的思路，顧先生曾說：「我們如果善學崔東壁，就應當超過崔東壁。」²「善學」就要「超過」，這對於我們是多麼重要的啟發。不僅如此，顧先生他們在討論問題時，也是讓各種意見充分發表，顧先生編《古史辨》時是如此，編《崔東壁遺書》時也是如此。就以後者為例來說，顧先生請他的朋友錢穆先生為這部書寫序，而錢先生的見解實際上是與他不同的。³甚至顧先生的老師，也就是促使他研究崔述的胡適之先生，同他的看法也是有同有異的。這裡不妨引用這兩位先生為此書寫的序中的話來作比較，顧先生說：

總之，他〔崔述〕根本的誤處，是信古史系統能從古書中建立起來，而不知古書中的材料只夠打破古史系統而不夠建立古史系統。這個問題，康有為已經抉摘出來了。⁴

他在此引用了康氏《孔子改制考》的第一卷《上古茫昧無稽考》，康氏在此中對崔述所採用的中國古史材料都取一概否定的態度，而顧先生頗以為然。這從當時破舊心切的角度來看，我們是能夠理解的。可是，胡先生在序中說：

總而言之，近幾十年的古史研究，大體說來，都已超過崔述的時代。一方面，他所疑為「後儒」妄作妄加的材料，至少有一部分（例如《檀弓》）是可以重新被估定，或者竟要被承認作可靠

² 顧頤剛：《崔東壁遺書序》，見顧頤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頁65。以下引此書只注書名、篇名和頁數。

³ 參見錢穆：《崔東壁遺書序》，《崔東壁遺書》，頁1046-1052。

⁴ 顧頤剛：《崔東壁遺書序》，《崔東壁遺書》，頁64。